联合国 S/PV.8504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四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八五零四次会议

2019年4月9日星期四上午10时10分举行

纽约

主席：	霍伊斯根先生	（德国）
	比利时	贝克斯廷•德布伊茨沃夫先生
	中国	姚绍俊先生
	科特迪瓦	伊波先生
	多米尼加共和国	特鲁略尔斯·亚布拉先生
	赤道几内亚	恩东·姆巴先生
	法国	德拉特先生
	印度尼西亚	查尼先生
	科威特	奥泰比先生
	秘鲁	梅萨-夸德拉先生
	波兰	莱维茨基先生
	俄罗斯联邦	涅边贾先生
	南非	马特基拉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皮尔斯女士
	美利坚合众国	科恩先生

议程项目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通报

19-10393 (C)







上午10时1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通报情况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波·格兰迪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现在请格兰迪先生发言。

格兰迪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今天邀请我，并感谢你代表过去和现在都是贵国本身、欧洲和全球难民事业最坚定支持者之一的国家。

从我的角度来看，当今时代面临的挑战非常大，从安全理事会成员的角度来看无疑也是如此。我将重点从我的角度谈谈这些挑战。首先，我要强调一下背景：难民和移民遭到空前污蔑，应对难民危机的传统措施似乎日益不足，并且有一种危机势不可挡的感觉。

我认为，在我们开始之前，最好回顾一下这场危机是对谁而言。对于一个试图带着孩子逃离帮派暴力的母亲来说，这是一场危机。对于一个想要逃离战争、侵犯人权行为和强迫征兵的青少年来说，这是一场危机。对于每天向数千名难民开放边境而资源匮乏的国家政府来说，这是一场危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危机。

但在我看来，把这描绘成一场无法管理的全球危机是错误的。有了安理会成员在最高级别代表的政治意愿，有了大会12月份作为第73/151号决议通过的《难民问题全球契约》所载的更好对策，就有可能并且迫切需要解决这些危机。

正如我过去说过的那样，安全理事会可以发挥关键作用。我将迅速重点谈谈三个领域:第一，安全理事会的一项关键职能：解决和平与安全危机；第二，为收容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提供支持；第三，共同努力消除解决办法面临的障碍，特别是人民返回本国方面的障碍。

首先，关于共同努力解决危机，我将着重谈一下利比亚局势。然而，在此之前我要重申，在近7000万流离失所者或难民中，大多数人正在逃离冲突。如果冲突得到预防或解决，大多数难民流将会消失。然而，从我们目前的情况观察，建立和平的办法极其不成体系，建设和平的办法非常不足。我们看到很多人的努力是治标不治本。

利比亚就是一例。我很清楚，由于过去几天发生的事件，利比亚问题被列入了安理会当前的议程。请允许我从我们的角度谈谈利比亚。正如成员们所知，我们正在与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组织）一道，不仅努力与境内流离失所的利比亚人合作，也与滞留在该国的难民和移民合作。他们中有许多人逃离了其他冲突，现在发现自己陷入了另一场冲突。

利比亚的安全局势一直非常脆弱。现在和过去一周，该国安全局势和这些状况正在接近崩溃的边缘。我们像联合国其他部门一样减少了工作人员数量。如果有可能留下的话，我们并不想离开，但是工作极其困难和危险。我去过那里两次，几乎从未有过如此不安全的感觉。即便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也试图前往关押难民和移民的拘留中心。昨天或今天上午，我们将150人成功转移到了安全地点，但这只是杯水车薪。

利比亚表明了我们在许多冲突中面临的挑战，例如安理会经常讨论的也门冲突。我们的人员面临不安全和准入问题，资源也相对匮乏。利比亚最迫切需要的，是安理会采取统一行动结束目前的军事升级，并强烈呼吁解救平民，包括被困在该国的难民和移民。在这方面，我赞同秘书长昨天发出的呼吁。然后，安理会如果顺利完成这些工作，最终必须采取统一行动来消除冲突的根源。现在要做到这

一点难度更大，但如果我们想避免旷日持久的冲突，这样做是必不可少的。长期冲突无疑会造成更多人流离失所，妨碍就难民和移民问题采取任何行动，其后果难以预测。

应该思考我们过去几个月在利比亚吸取的教训。现已投入大量资源加强海岸警卫队，以阻止难民向欧洲流动，但在为该国实现和平与稳定方面，没有提供多少其他投入。这样做效果不佳。利比亚海岸警卫队无法在海上有效救援民众，并且在可怕、不可接受的条件下拘留难民和移民仍然是该国普遍存在的模式。

我的确认为，必须在这些移民长途流动的两端采取更具战略性的做法，我们已经吸取了这一教训。我们必须审视人们离开的根源和原因，如冲突和贫困。人们将不可避免地不断抵达欧洲，在那里我们必须努力建立一个基于休戚与共做法的接收体系，尽管这方面存在政治困难。

我要说的第二点涉及接收国。我知道在当今世界不易达成政治解决办法，所以我们的期望必须切合现实。被迫流离失所现象在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在，我们必须对其进行妥善管理。一些国家与捐助方——一些安理会成员是捐助大国——以及世界银行和私营部门等发展行为体合作，采取了非常好的办法。非洲有许多非常积极的例子，如埃塞俄比亚、乌干达、肯尼亚和尼日尔，也有其他例子。然而，通常情况下，提供的支持还不够。

在这方面，我要谈谈委内瑞拉的情况。安理会非常关注委内瑞拉国内现状，这是正确的。我知道，明天安全理事会将举行一次特别会议，重点讨论这一具体问题。在这方面，我们与联合国其他机构保持一致。我们必须同其他人一道呼吁尽快找到解决这场危机的政治办法。但是，决不能忘记——有时我担心安理会正在忘记——这场危机的另一个方面:人员外流。已有350万委内瑞拉人离开该国。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在难民和移民问题上彼此合作，因为这些人员的组成十分混杂。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以及巴西是受影响最大的国家，但是，接纳委内瑞拉人的国家总共约有15个。

拉丁美洲再次表现出非凡的团结一心。就在我们发言的此时此刻，该地区国家正在基多召开重要会议，这是基多进程的一部分，旨在增加区域合作以应对委内瑞拉局势。我呼吁这些国家尽管承担重负，但继续开放国门，减少对委内瑞拉人施加的限制。

有必要通过联合国的渠道，增加双边层面对这些国家的支持—我们处理该地区人道主义危机的呼吁是全球供资情况最差的之一—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增加来自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否则，这些国家的政府将可能在国内受到政治攻击，承受数百万委内瑞拉人带来的难以为继的重负。

世界上85%的难民居住在穷国或者中等收入国家。这也是危机发生的地方，包括委内瑞拉的情况。因此，我吁请加大支持力度。正如我们不仅在哥伦比亚或秘鲁、而且在黎巴嫩和孟加拉国所看到的那样，这种热情好客绝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全球契约为改进应对提供了蓝图，这种蓝图不只是人道主义方面的，而且超出该层面而顾及中长期。这种应对不仅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说，而且安理会的看法是，对于整个地区的稳定都至关重要，因而也是安理会的直接关切。

我想提出的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意见涉及这样的事实，即：解决被迫流离失所问题的办法是存在的，即使局势困难也是可能的，但是，我们必须共同努力，以消除各种障碍，特别是那些使民众无法返回本国的障碍。在我描述的这种背景下，我们越来越多地面临这样一种情形的挑战，即：和平并未完全实现，但是局势正在朝着这个方向演变。这常常变成在并不理想的情况下向难民施加返回的压力，而且它还导致一些难民不顾这些情况而决定这样做。

与一些人的想法相反，本组织并不阻止返回。我们不阻止返回。我们认为，返回是一种权利，但是在安全缺失和没有基本支助的不利情况下选择不返回同样是一种权利。换言之，我们想再次吁请尊重难民的自由和知情选择权，使返回做到有尊严、有保障并且安全，这句话几乎成了我们使用的一句口号。对此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共同开展工作，以消除返回的各种障碍。

当然，这方面的一个恰当例子是叙利亚。中东近600万叙利亚难民中的绝大多数想返回。他们在调查中这样告诉我们，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点。大多数人现在仍拿不定主意这样做。重要的是，要从难民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他们有三方面的关切：物质关切，如住房、服务和就业；安全关切，包括征兵和一般性报复；以及在财产和文件方面的各种法律与行政障碍。我们就所有这些问题同叙利亚政府建立了相当具有建设性的对话。我谨感谢俄罗斯联邦支持这种对话。

但是，我们需要叙利亚方面加快行动和反应的速度，还需要准许难民署和联合国工作人员出入民众返回的地区，以便建立他们做出这种艰难选择所急需的信任。与此同时，必须继续支持难民接纳国—黎巴嫩、约旦、土耳其、埃及以及伊拉克—今后一段时间它们将接纳大量的这些难民，如果我不说这一席话，将是我的失职。

我还想提及缅甸局势，我已在安理会大厅这里多次提出该问题。如安理会成员所知，2018年6月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难民署已与缅甸政府签署一项备忘录。其执行工作一直进展缓慢，由于安理会成员熟知的若开罗兴亚救世军的攻势，若开邦北部的安全局势使执行更为缓慢。最近，我们收到暴力侵害平民行为引发新的流离失所的报告，这当然令人担忧。

我高兴地报告—这是我以前未能做到的，缅甸政府最近授权实施34个项目。这可能看似很多，但是与需要做的工作相比却很少。我们应该开展的项目应该以百计数，保持该势头将是明智的。我希望不久访问缅甸，目的正在于此。覆盖各族群的包容性发展是重要的，但是正如我常说的那样，这并不足以打破几十年来普遍存在的排斥、流离失所和脆弱返回的循环。请允许我冒着在这里老调重弹的风险，再说一遍：返回必须是自愿的。我想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点。恢复安全是这方面的关键，因为它对于落实若开邦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各项建议至关重要，特别是就入籍、证件、获取服务和结束法律面前的不平等而言，这些是影响罗兴亚人的情势所表现出的特点。

我想，继续坚持要求缅甸政府给出一些明显信号将是有益的，包括：并未离开、仍留在当地的罗兴亚人的通行自由；解决被困在难民营困苦情况下的境内流离失所者的问题；或者处理我们不时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散布仇恨罗兴亚人言论的行为。

与此同时，让我们不要忘记，与叙利亚局势类似，孟加拉国接纳了100万处境艰难的民众。两周后，我将与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和移民组织的代表一道访问该国。这将为我提供一个机会，回顾我们需要国际支助，以便至少让生活在艰难流放中的民众享有尊严。

我的最后几句话将回到我最初的意见。安理会成员可能知道，我一直是一名国际公务员，三十多年来一直与难民一道工作。在该领域的职业生涯中，我曾见过在安全理事会的支持下，在实地做出的一些应对表现出精诚团结，甚至是英雄主义的精神。毫无疑问，在我巡游世界、探讨该问题时我看到，这种团结精神在许多国家依然保持每日的强劲。

但是，在这三十五年中，我从未在有关该问题的政治用词、媒体、社交媒体甚至是日常的讨论与交谈中见过如此的恶毒，如此的恶意。悲哀和凄惨的是，这种恶毒常常侧重于难民、移民和外国人。这应引起我们大家的关切。新西兰基督城发生的事件也是这种恶毒的政治用词的结果。但是，让我们

学习新西兰人民和领导人的榜样，坚决和有条不紊地应对这种恶毒趋势，重申声援难民所依据的价值观，正如可持续发展目标再次确认的那样，如果不包容各方，我们各国社会将不会实现真正的繁荣、稳定以及和平。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格兰迪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由于这是高级专员自2017年年底以来首次来到这里，我再次鼓励各位成员借此机会就这一问题提问，请他作出回应，增进会议的互动性。

第一位发言者是赤道几内亚代表。由于他代表安全理事会的非洲成员发言，我认为各位成员都会同意，他可以使用两次沙漏。

恩东·姆巴先生（赤道几内亚）（*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代表安全理事会的三个非洲成员——科特迪瓦、南非和赤道几内亚——发言，我荣幸地担任这三个国家小组的主席。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给我们两倍的发言时间。我本来希望可以使用三次沙漏，不过两次也够了。

我们感谢德国召开今天的通报会讨论难民问题，我们认为这非常及时。我们真诚感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波•格兰迪先生就世界各地难民的困境作了详细和全面的通报，通报强调了世界不同地区令人担忧的难民人数，这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到，世界需要务实和紧迫的解决办法来解决充满挑战的难民困境。我们借此机会赞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努力履行义务，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下实施难民保护方案。

冲突是导致被迫流离失所的主要因素。这种现实情况要求我们解决武装冲突的结构性原因，这需要集体长期战略。国家在寻求预防性政治和外交解决办法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高级专员介绍的当前统计人数巨大，这提醒我们，我们现在处在人类历史上难民人数已超过最高纪录的时期。作为国家，我们必须现在就采取行动。

非洲大陆也受到大规模被迫流离失所问题的影响，世界流离失所人口中有100多万在非洲。我们认识到我们大陆的难民危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非洲联盟承诺实施具体措施。在这方面，在《2063年议程》概述的长期愿景框架内，非洲联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于2016年通过了《非洲共同立场》，即第604（XXVI）号决定，以便加强非洲大陆的人道主义行动。《非洲共同立场》界定了非洲新的人道主义架构，包括创建非洲人道主义机构，负责执行人道主义行动。新的人道主义架构还强调必须解决根源问题和实现持久解决，并且加强各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应对非洲大陆被迫流离失所挑战的能力。

在这种背景下，2018年7月在努瓦克肖特举行的国家元首会议通过了非盟第707（XXXI）号决定，宣布2019年为”难民、回返者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寻求持久解决非洲被迫流离失所问题”年。此外，我们感到自豪的是，我国国家元首奥比昂·恩圭马·姆巴索戈总统阁下被任命为这项决定和倡议的保证人。

我们认识到，非洲鼓励难民的努力应该得到支持，并与国际努力保持一致。在这方面，我们欢迎通过2018年《全球难民契约》表达的情绪，这表明国际社会致力于更有效地处理大规模流离失所问题。我们赞扬不顾资源有限开放边境接纳难民的国家，并呼吁国际社会履行承诺，共同分担负担和责任。我们在这里愿特别提及孟加拉国。

今年，非洲联盟将纪念两项关于被迫流离失所问题的重要条约，即1969年《非洲统一组织关于非洲难民问题某些特定方面的公约》通过五十周年和2009年《非洲联盟保护和援助非洲境内流离失所者公约》（《坎帕拉公约》）通过十周年。我们希望所有这些法律文书将在改善难民生活的愿景中得到

体现。我们欢迎非洲联盟、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及其他感兴趣的利益攸关方开展协作。

最后，我们重申，在难民事业中，所有国家必须团结一心。我们表示，我们完全致力于在这些紧急努力中进行合作。

我想问一个问题：可以考虑采取何种模式来建立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非洲联盟之间的强有力伙伴关系，从而确保执行非洲国家元首在努瓦克肖特通过的决定，找到持久办法解决非洲的被迫流离失所问题？

查尼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我们深感关切地注意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最新报告（《2017年被迫流离失所问题全球趋势报告》）提到，有6850万人因各种各样的人道主义危机而被迫流离失所，其中2540万人是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我们认为，有三个主要挑战需要被视作优先事项。第一个挑战是新出现的冲突，它们导致已有人道主义危机恶化。难民署在其《2018年年中趋势报告》中提到，2018年上半年又有520万人由于新的冲突被迫流离失所。第二个挑战涉及没有得到充分实施的持久和可持续解决方案。根据难民署2018年报告，有140万难民急需重新安置和自愿遣返。第三个挑战是资金严重短缺。2019年，难民署需要87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而目前仅有16.85亿美元可用。这些就是挑战。

这种黯淡局面令过境国，特别是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严重关切。我们目前接纳了来自47个国家的14000多名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他们正在等待被安置到第三国或自愿返回家园。当然，印度尼西亚致力于减轻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下的任何人类苦难。2016年，我们颁布了一项援助难民的总统令，这超出了我们的国际义务。

印度尼西亚还在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任务框架内与它们密切合作，处理问题和寻找解决办法。我同意格兰迪先生的观点，这方面的关键词是“管理”和“合作”。遗憾的是，就此类合作而言，印度尼西亚境内难民获得安置的人数从2016年的1200人继续下降到2018年仅508人。这只是我们在重新安置方面看到的惊人趋势的一个微小例子。我们还从这个数字看到，在世界范围，接受难民的意愿呈现下降趋势。对此，我们必须做些什么。

我们认为，必须考虑采取一些办法来应对全球难民危机构成的挑战。第一，我们必须通过例如下列方式消除人道主义危机的根源：使和平、安全与发展之间的联系主流化，在联合国系统内建立协调一致性，并放眼长远，不仅看到格兰迪先生所提到的冲突或贫困等显而易见的原因，而且还看到新查明的原因，即气候变化。

第二，我们必须促进包容性参与进程和多利益攸关方办法。联合国与区域和国家实体、包括所有人道主义行为体和利益攸关方进行更强有力的协作，将加强人道主义行动的效力。不仅在来源国，而且在过境国和接收国，都需要参与性进程。正如格兰迪先生所提到的那样，过境国承受的负担正变得更为沉重。必须提出更创新的资助办法，并探索与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协作的潜在领域，以弥补人道主义援助的资金缺口，不仅在中转国和接收国，而且在来源国，因为在来源国，根本原因可能是经济困难，而经济困难可能导致冲突。

最后，全球难民契约应作为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其议定书缔约方改进难民管理的指南，同时顾及各国具体资源、能力和国际义务。在目前情况下，《全球契约》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联合国会员国应接受该契约，以便发出正确的信号：我们没有将需要我们集体支助的难民拒之门外。会员国还应既接受全球难民契约又接受全球移民契约。拒不接受这两项契约中的任何一项都会向难民营中的许多绝望者发出错误的信号。

为做到互动，我想问一下格兰迪先生提出的一点，即难民选择不回返。难民在期望接受他们的国家将门关闭时，除了回返，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如

果目的地国将门关闭，难民将进退两难，负担将落到过境国身上。

高级专员还谈到了中长期展望。我国代表团同意这一观点，但现在对难民来说最重要的是立即解决问题和应对当前挑战。

最后，本次会议发出的重要信息应当是，国际社会仍然存在休戚与共精神，难民没有被遗忘，也绝不会被遗忘。

姚绍俊先生（中国）：我感谢难民高专格兰迪先生所作的通报。

当前，国际难民人数逐年攀升，难民形势持续恶化。战争和冲突仍然是难民产生的主要原因。发展中国家接受了全球大部分难民，承受沉重的社会和经济压力。同时，国际社会援助意愿下降，人道主义需求和资金援助间的缺口持续扩大，各方排外情绪和难民问题政治化日趋严重。国际难民形势仍然严峻。

去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难民问题全球契约》。这是国际社会合作应对难民问题的积极尝试，也是继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以及1967年议定书之后难民问题全球治理迈出了重要一步。中方对此表示赞赏，支持难民署在格兰迪高专领导下推动各方充分沟通，逐步落实《契约》的内容。

中方认为，解决难民问题应在尊重国家主权基础上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

一、国际社会，尤其是有能力、有责任的国家，应加大投入，增加对接收国和接收社区的支持和援助力度，消除针对难民的排外和歧视。解决国内流离失所者问题尤其应当尊重当事国政府的作用。

二、应致力于解决造成难民和流离失所现象的根源性问题，和平解决争端，减少武装冲突，消除极端贫困，促进经济发展。只有解决战乱、冲突、贫困等根源性问题，才能使难民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安理会应根据《联合国宪章》授权，加大政治解决热点问题的力度。

三、应坚持客观、中立、非政治化的国际人道主义基本原则，这是确保国际难民保护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国际社会在处理难民事务时，应秉持客观、中立原则，避免干涉有关国家内部事务，防止国际难民保护机制被政治化和滥用。

长期以来，中国与联合国难民署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同时坚持通过多、双边渠道为各地难民和东道国社区提供人道援助，改善其生活状况。中方愿继续加强与难民署在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方面的合作，与各方一道为完善全球难民治理贡献力量。

特鲁略尔斯·亚布拉先生（多米尼加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感谢格兰迪高级专员今天的通报。

多米尼加共和国欢迎召开今天的会议，并愿同各方一道齐心协力满足和照顾因武装冲突、暴力、侵犯人权行为和迫害而被迫离开家园的数百万人的需求。我们特别有兴趣寻找机制来处理源自这些流离失所者以及接纳他们的社区的严重问题和挑战。我们认为，在寻找此类机制时，必须支助流离失所者并让其参与，以满足其具体需求。

今天，有大量图片显示，民众流离失所，人民遭受苦难，梦想破灭，母亲祈求回家，父亲盼望再次工作，儿童梦想有个童年。12岁的叙利亚难民Joury的情况就如此。Joury生活在约旦境内一个难民营中，爱画花园画，因为这是她记得的家园中的情景，她相信自己将永远无法返回那里。

同样，在阿富汗，据估计每天有1000多人，多数是妇女和儿童，成为流离失所者。在希腊沦为难民的Shakila情况就是如此，她与丈夫和三个孩子离开阿富汗去寻找更美好的生活，她仍然不确定自己是否会找到这种生活。

在南苏丹，形势极为严峻。由于粮食无保障，400万人离开家园去寻找安全避风港。气候变

化效应，例如干旱和洪水，造成安全饮用水大量短缺，从而加剧他们的境况。安吉丽娜的情况就是如此，她多次离开自己的村庄。她游泳，让她的儿子在塑料筏上漂浮，一起渡过深水区前往避难所，在那里，她依靠人道主义援助维生。她如果能养活自己的孩子，哪怕这意味着自己种植和生产粮食，也会感到幸福。

在缅甸，形势同样逼人。大批罗兴亚人跨越边界进入孟加拉国的科克斯巴扎尔，随之出现的结果是，有100多万人依靠人道主义援助来满足其基本需求。我们举四个孩子的母亲、寡妇Daw Phyu为例。2012年6月，她离开了缅甸，将其残疾女儿抛在身后。她在一个月后遇见了她，并用手语告诉她，自己很难过。六年后，Phyu Ma仍生活在一个一居室的陋室中，等待着安全的回家机会。

在索马里，情况别无二致。经过二十年的冲突和无数自然灾害，300多万索马里人成为难民或境内流离失所者，近250万人的基本粮食需求得不到满足。这就是22岁的女孩Hadija的境遇，她在旱灾中失去牲畜后，不得不和她的两个孩子一起离开村庄，目前正在难民营中等待回归正常生活。但她只是同个地区15.5万人中的一员，他们现在靠亲戚朋友的慈善接济度日，缺少对更美好未来的希望。

鉴于局势如此恶化，我们必须寻求解决危机的办法。我们认识到，必须加强和倡导一种人道主义行动与发展举措相辅相成的办法，以处理冲突的根源问题，确保难民返回原籍地后为其提供可持续的解决办法，并创造条件来提高受影响社区的复原力。

我们不能不提影响数百万委内瑞拉人的局势，他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以寻找食物、药品和更好的生活条件。对他们来说，背井离乡并不是一种选择，而是迫不得已。

最后，我们认识到，我们正面临史上最大的难民危机，这给联合国及其伙伴以及收容社区提出巨大的挑战。我们也认为，必须始终将难民的人格尊严放在我们所有行动的中心。我们重申，在任何情况下，难民的重新安置或返回都应在安全和有尊严的条件下进行，并且在了解其今后境况的基础上自愿进行。

皮尔斯女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格兰迪先生的通报。我认为，这显然是一个令安理会许多成员动容的议题。我还要赞扬高级专员及其所有工作人员，包括世界各地的工作人员。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可能是在人们生命中最悲惨的时刻看到他们，高级专员及其团队面对日益严重的不安全和流离失所状况，开展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我请求转达我们的谢意。联合王国通过核心供资和国家供资大力支持难民署，去年我们捐助了近1亿美元。我也饶有兴致地听取了赤道几内亚代表的发言，他谈到非洲联盟对该议题的兴趣及建立一个人道主义机构的愿望。我很乐意看到人道主义问题得到如此的重视。

难民署在返回问题上发挥的主要作用基本上可归结于制定国际标准，这是我们评判这些重大冲突的依据。返回是关键的持久解决办法的一部分。必须牢记，对大多数难民和接收国来说，返回在一定程度上是首选办法。但正如格兰迪先生所说，这并非始终可行，有时会导致一些相当有害的取舍，即鼓励难民在严重缺乏安全、自愿和尊严的情况下返回家园。我认为，他要求我们更有战略眼光是正确的，如果他在这方面还有任何话要说，我谨表示欢迎。

审视他提到的各个国家，我认为，可以看出，现实是困难的。我觉得，他谈到的利比亚状况令人担忧。我很遗憾工作人员受到了压力。如果他还能告诉我们哪些直接措施可以起到帮助，将会有助于我们希望在本周晚些时候就利比亚问题进行的讨论。

在叙利亚，我们不支持在时间不允许的条件下返回，我们期待难民署继续为安全、尊严和自愿这三大原则制定标准。

看看缅甸，我们已与难民署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道努力，尝试并帮助创造条件。高级专员提到的34个项目是可喜的，但这当然还不够。我们欢迎他进一步说明我们具体如何从安理会帮助扩大这些项目，以及与政府签订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情况如何。

有鉴于此，我们认识到罗兴亚人、缅甸和孟加拉国等局势的挑战。我们不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遣返进程如何进行，只要坚持国际原则。明天我们将举行一次关于委内瑞拉的通报会，高级专员之前援引的数字对此将非常适切。我期待在本周晚些时候听取秘鲁和哥伦比亚代表关于难民负担的发言。

我想谈谈《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提供长期解决办法的重大机遇，着眼于就业、教育、基础设施和谋生机会，但是，我们都知道，落实这些解决办法的方式必须支持那些慷慨的接收社区和接收国。我认为，《全球契约》中的全社会办法肯定是正确的，因为它把各种合适的行为体召集在桌前，并借此让难民署专心于它的核心任务。我们期待12月的首次全球难民论坛，并准备好尽我们的一份力。

最后，格兰迪先生关于恶毒言论的话让我印象深刻。我认为，这是安理会应该再次探讨的。在审视单个国家的局势时，我们应提醒各方所涉的的人道主义原则。

莱维茨基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普·格兰迪先生令人耳目一新的通报。我也谨借此机会与其他同事一道，赞扬他和他的工作人员的全心投入、日常工作及其向身处悲惨人道主义局势的所有可怜人提供的援助。

仅去年一年就有685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这个数字不言自明，我无比同意高级专员所说，难民流动只是持续冲突、广泛和系统性侵犯与践踏人权、经济腐败治理不力等情况的一个症状。有两个事实：所有这些难民来自安理会议程上仅仅五六个国家。格兰迪先生提到了叙利亚、缅甸和利比亚。我还可以加上阿富汗、南苏丹、索马里，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还有我们的欧洲近邻乌克兰。我们面临着多项挑战。如他所说，我们必须关注的重点不是治愈症状——这还不够——而是处理这些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流动的根源问题。为了最有效地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采用全面的做法。2005年，我们各国领导人认可了安全、发展与人权之间的关联。如果我们安理会想要处理这些问题，就需要关注所有这三个角度。

我要谈谈波兰认为非常重要的三个问题——人道主义法、儿童处境和残疾人的处境。

首先，促进和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难民法和人权法，对于确保身陷冲突者的生命、健康和尊严得到保护至关重要。今年，我们在纪念《日内瓦四公约》七十周年和保护平民议程二十周年之际，需要加快努力，并呼吁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普遍、明确遵守、执行并确保遵守国际人权法。此外，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应确保保护人道主义活动以及人道主义和医务人员的生命。我还赞扬我们的德国和法国同事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

儿童约占难民人口的一半。我是一个7岁男孩的父亲，很难想象他需要逃离家园，没有东西吃，也没有学上。儿童特别容易受到伤害，应该得到适当的救助和保护以及保健、教育和社会心理支持。妇女和儿童也面临被贩运和遭受性暴力的极大威胁。

残疾人在获得拯救生命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保健方面遇到障碍，更容易遭受暴力、剥削以及被排除在现有服务之外。我要回顾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还在担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一职时所说的话：

“残疾难民经常不为人所见，经常被遗忘，而且经常被忽视，他们是所有流离失所者中最孤立、遭受最严重社会排斥、处于最边缘化状态的人”。

被迫流离失所，无论是灾难还是冲突造成的流离失所，都会给人带来巨大痛苦。满足各种处境危险的群体的权利和需求应成为处理难民问题的国际对策的核心内容。

最后，我再次感谢格兰迪高级专员的通报。我们支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为维护世界各地难民的权利和福祉开展活动。我们要鼓励高级专员更频繁地向安理会通报情况，特别是在需要尽早采取行动时。波兰将继续在安全理事会开展工作，以确保和平和防止冲突。

最后，我想问一下高级专员，他认为在应对全世界各种人道主义问题的过程中，应当如何不仅加强安全与发展之间的联系，而且还要加强——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点——第三个支柱，即安全、发展和人权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波兰代表，我认为他可以从发言较短的中国代表那里借用一些时间。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英语发言*）：我对图林根沙漏有个新想法。我发言时请把沙钟平放。

（*以俄语发言*）

我们欢迎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并感谢他的通报。我们深为赞赏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在造成大规模难民流动的重大人道主义危机局势中开展富有成效的工作。我们希望，我国支持的新的《难民问题全球契约》将有助于加强保护难民的国际制度。

今天向难民和无国籍者提供帮助，是旨在维护国际和平、安全与稳定的综合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对欧洲严峻的移民形势感到担忧，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中东和北非民众仍可不受控制抵达。海上死亡事件以及混合移民潮中存在无人陪伴的儿童的情况尤其令人担忧。我们不得不再次指出，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负责任地干涉中东北非国家内政的结果。正如高级专员今天所说，位于利比亚境内、被关押在拘留中心并遭遇各种形式虐待的难民和被迫移民者的情况需要得到关注和解决。

俄罗斯正在为加强国际难民保护制度作出贡献。我们正在接收并安排来自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各国大量难民和被迫移民者，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提供大量人道主义援助，并协助原籍国创造条件，使难民能够返回。2018年夏天，俄罗斯发起了一项促进叙利亚难民自愿返回家园的倡议，我们看到这一进程的势头得以持续。每天大约有1000人前往叙利亚，主要来自黎巴嫩和约旦。自2018年7月以来，共有177 000多人返回。我们必须帮助叙利亚人实现这一合法权利。我们认为，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在这方面可以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我们敦促难民署加紧努力，协助叙利亚人回返。俄罗斯也正在这方面开展工作。对民众来说，叙利亚越来越多的地区正在变得安全。我们正在积极努力恢复水电供应、学校、医院和住房等基本基础设施，以及进行人道主义排雷工作，并为需要紧急护理的人提供帮助。

我要特别强调，叙利亚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回返进程必须是自愿的，不应该用人为的情况进行对冲，也不应该被政治化。有些人试图这样做，公开恐吓希望返回家园的人，阻碍他们离开难民营。大部分国际援助非但没有帮助难民返回，将其安置在永久性住所，反而为叙利亚境外的难民营提供支持，从而维持现状。我们特别担心鲁克班难民营的情况，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全靠打“人道主义点滴”生存，生活条件完全无法接受。绝大多数人都想离开营地。俄罗斯已经开放了两条人道主义通道，使人们能够离开营地。叙利亚政府也做了必要的准备工作，将人员疏散到他们选定的居住地，即拉塔基亚、哈利迪耶、阿马尔、霍姆斯、姆

欣、Al-Qaryatayn和帕尔米拉以及大马士革和阿勒颇郊区。

俄罗斯军方与难民署、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叙利亚红新月会和叙利亚当局的代表一起举行了数次协调会议，为重新安置鲁克班居民制定分步骤措施。我们愿意在没有先决条件，也不对该问题所涉及的人道主义问题加以任何政治化的情况下，继续与包括联合国、美国和约旦在内的所有有关方面就鲁克班问题进行对话。

最后，我愿再次强调，俄罗斯打算继续为难民署的活动提供全面支持和协助，这些活动对于数百万被迫离开家园的人来说至关重要。

梅萨-夸德拉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召开这次通报会，并感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普·格兰迪先生及时全面的通报，以及他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与无私的工作人员一起开展的工作。

秘鲁一直特别关注全球约2 500万难民令人震惊的遭遇，同时对他们表示声援。我们意识到这种情况可能会影响到每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对每年都在增长的这一令人震惊的数字，我们欢迎2018年12月通过了《难民问题全球契约》，为建立更加公正和公平的机制以打击仇外心理和歧视奠定了法律基础。《契约》反映了国际社会承诺寻求合作机制，以处理跨国问题，支持在原籍国创造条件，促进难民安全和自愿回返。促进包括各个部门、特别是国际和区域金融机构执行《全球难民契约》的工作特别令人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请格兰迪先生进一步阐述他在这方面的意见。

处理这一议题是安理会的优先事项。只要说这一点就够了：世界上57％的难民来自安理会议程上的国家：南苏丹、阿富汗和叙利亚，更不用提孟加拉国境内罗兴亚人的严重处境、来自利比亚的移民和难民的危急状况以及由于最近的冲突而面临的潜在恶化。同样，我们担忧委内瑞拉难民和移民在整个大陆，包括我自己的国家持续增加和严重局势——这个问题将在明天详尽讨论。我们彰显一些国家所展现的团结精神和提供的资源，它们不顾这种动员可能引发的困难，正在收容这些难民。

秘鲁认为，消除这些国际流离失所现象的根源并及时地集体应对我们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和脆弱性，如气候变化，荒漠化、日益严重的不平等、腐败、武器集结以及暴力极端主义是关键。除了导致具有全球影响力和跨国性质的其它现象外，暴力极端主义还导致恐怖主义。必须通过加大妇女和年轻人的参与力度来解决所有这一切问题，这是构建实现和平、包容和可持续未来的共同愿景的唯一保证。

在这一方面，安全理事会可以在确定预防冲突和建立可持续和平的努力和工具的优先次序方面发挥作用。为此，应根据秘书长和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和方案必须提供的及时风险分析和管理计划，促进一种更系统的观点。

最后，秘鲁希望重申其对格兰迪先生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重要工作的承诺。我们希望将来有机会继续交换意见。我们相信，在他的领导下，并超越当前难民危机的复杂性，以及在国际社会支持并具有政治意愿的情况下，我们将能够为今天处于脆弱、危急境地的数百万人提供新的机会。

奥泰比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谨欢迎菲利波•格兰迪先生，并非常感谢他刚才作了全面和详细的通报。我还要赞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的重要作用。我赞赏科威特与难民署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因为本区域许多国家的难民问题正给我们造成不利影响。我们通过自愿捐款尽可能多地向难民署提供捐助。我们将继续这样做，以减轻难民的痛苦。

格兰迪先生在通报中提供了许多重要细节，我不会重复他引用的数字。然而，安全理事会与难民署之间显然存在关系。当安理会无法解决、遏制或管理冲突时，难民署和其它有关专门机构的工作就

会变得复杂化。因此，安理会与难民署以及其它有关机构之间的关系是成比例的。由于无法及早防止冲突爆发并消除其根源，导致难民流动，造成巨大的政治和财政损失，由此导致区域不稳定。这是冲突和流离失所的恶性循环。

科威特认为，必须通过消除冲突根源来尽早解决冲突，以防止冲突加剧，并确保冲突不再爆发。这与秘书长的愿景和本组织的作用相契合。联合国必须通过其所有机构实现这一目标。安全理事会必须发挥其作用并肩负起责任，利用其掌握的所有工具来结束冲突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毫无疑问，只有通过全面解决与强迫流离失所相关的挑战的各个方面，才能持久、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国际危机需要采取国际方法，在区域和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加以应对。我们非常重视难民署通过《全球难民契约》全面应对难民问题的努力。我们还呼吁遵守国际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同时确保充分执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

人道主义援助是应对当前流离失所危机的重要因素。维护所有有需要的人的尊严需要有效的短期计划以及持续和长期的解决方案。正如格兰迪先生在通报中指出的那样，我们继续看到国际社会对全世界难民的慷慨援助和声援。必须强调收容和支持大量难民的社区和国家所发挥作用的重要性。我们还强调机构、民间社会及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它们不知疲倦地工作，为冲突地区所有有需要的人提供有尊严的生活和康复。

必须允许联合国和其他人道主义组织开展工作，向难民提供全面和不受阻碍的人道主义援助及基本服务，包括保健和教育以及心理和社会支助。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支持难民署。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在向有需要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我们目睹了包括难民署在内的联合国机构为接触那些需要援助的人而必须解决的危机，有时他们需要数月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科威特多次提议，不应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来阻止向流离失所者和难民提供援助。在这一背景下，安理会可以做些什么？

第二，关于难民署与缅甸政府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格兰迪先生提到了罗兴亚难民以及他们以安全、有尊严和自愿的方式返回的问题。这是一项国际要求。缅甸表示不反对难民返回，孟加拉国也表示同意他们返回。随着谅解备忘录即将结束，鉴于实地条件尚不利于他们返回，我们如何能够改善这些条件并加速难民返回原籍地？

德拉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普•格兰迪作了非常有启发性和重要的通报。还请允许我诚挚地赞扬他的工作以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各团队在保护难民和捍卫其权利方面所做的出色工作。正如格兰迪先生所知，难民署可以指望法国在我们模范伙伴关系范围内提供大力支持，正如它可以指望法国承诺确保在欧洲和全世界无条件地尊重庇护权一样。

正如高级专员格兰迪指出的那样，2019年是一个有着糟糕记录的一年：7000万人被迫流亡并成为难民。我不打算提及一系列相关的国家，但要重复格兰迪先生所说的话，并强调我们认为必须指导我们行动的三个优先事项：第一，分担责任；第二，解决流离失所的根源；第三，尊重指导和帮助难民返回的基本原则。

首先，关于分担责任和必须团结一致的问题，接收难民是一项国际义务和道德责任。各国有责任在其领土上保护因遭受迫害而逃离本国的外国国民。我们还必须确保这些人有安全和合法的通道，他们流亡时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本着这一精神，法国与难民署一道，在尼日尔和乍得组织了保护行动。大约1150名特别脆弱的难民已经在法国得到重新安置。

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支持处于大规模流离失所前沿的国家。只有通过协调一致的做法，我们才能改

善对难民的照顾，对移民流动开展更好的管理。我们还必须加大努力，打击贩运者和走私者。这也是一个优先事项。

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我们制定并通过了《难民问题全球契约》。我们必须加倍努力，进入《契约》的执行阶段。难民署于12月将举办的全球难民论坛是对难民保护和照料的挑战作出集体和有效反应的重要步骤。法国将与难民署一道出席这一论坛，难民署是迄今为止从法国获得人道主义援助最多的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我们呼吁所有国家和相关行为体参与并承诺执行《契约》。

第二，关于解决人口流离失所的根源问题，众所周知，不安全和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是冲突的特征，也是流离失所的主要原因。必须预防和抑制这两种现象。安全理事会也有责任为持久解决危机创造条件。

在叙利亚，境内流离失所者达600多万人，难民为570万人，只有可信的政治进程才能保证局势稳定，防止进一步产生难民潮。在利比亚，暴力升级已经将2800人赶出冲突地区，加剧了移民和难民已经岌岌可危的状况。我们呼吁利比亚所有领导人继续参与秘书长特别代表领导的进程，因为只有政治解决方案才可能以可持续的方式稳定该国局势，才能应对与移民有关的挑战。在这方面，我向高级专员提出一个问题，并重复他已经说过的关于难民署和利比亚当局合作确保移民和难民得到保护的话。

关于巴勒斯坦难民问题，该地区有500多万巴勒斯坦难民，我们呼吁以国际商定的参数为基础，在未来以色列-巴勒斯坦协议的框架内，实现现实、公平、公正和持久的解决。与此同时，在美国暂停捐款的背景下，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必须继续得到我们的全力支持。今年，法国将对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捐款增加了一倍。

最后，关于委内瑞拉，我们明天将再次讨论该国的局势，该国每天约有5000人离开，现在有340多万委内瑞拉移民和难民。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政治局势和体制，只有举行新的自由、透明和可信的总统选举，才能结束这场危机。

第三，关于尊重难民返回的基本原则，正如格兰迪先生所说，每个人都有责任确保难民返回原籍国的自愿性质。各国必须确保在获得关于人们计划返回地点的信息的基础上，为安全和体面的返回创造条件。仅举两个例子，众所周知，今天在叙利亚或缅甸，这些条件根本没有得到满足。在叙利亚，法国极为关切叙利亚安全部门任意逮捕正在返回家园的难民的报道。在缅甸，如果没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和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罗辛亚难民就不可能返回。

菲利波·格兰迪在开始这一重要通报时指出，对难民的态度是指导我们当代人的准则的决定性特征之一。我赞同他所说的话，并重申法国的信念，即只有采取全球、集体的负责任和支持的作法，才有可能有效和可持续地应对难民人数不断增加带来的挑战。法国决心继续为此作出一切努力。

科恩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美国致力于援助那些因无法控制的情况而流离失所的人。因此，我们仍然是全世界人道主义援助最大的提供者。我们的重点是在尽可能靠近难民家园的地方提供援助，帮助他们，直到他们能够安全、自愿和有尊严地返回家园。然而，人道主义需求大大超过任何一个捐助者的能力。我们鼓励其他国家以及发展行为体和私营部门增加对世界各地的人道主义捐助。

正如许多同事所说，《难民问题全球契约》为作出可预测的反应和加强会员国之间分担负担提供了基础。我们支持《契约》的主要目标。我们鼓励非难民收容国和未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国家做更多工作。我们支持减轻难民收容国承受的压力，包括采用第三国选择办法，并促进传统重新安置之外的机会。我们还支持努力改善原籍国的状况，以便可以安全和自愿返回。

我们赞扬许多收容国作出巨大努力。这包括为来自委内瑞拉和叙利亚、面临前所未有困境的数百万弱势群体敞开大门的国家。我们注意到世界各国为保护难民采取了令人钦佩的步骤。埃塞俄比亚正在扩大难民获得工作、教育和其他基本服务的机会。约旦承诺允许所有儿童接受公共教育。在土耳其，近400万难民获得免费医疗保健、工作和教育。泰国已经向3万多名无国籍人给予国籍，巴基斯坦已经开始就向在该国境内出生的难民给予公民身份问题开展全国对话。

我们必须避免过早地催促个人返回他们逃离的国家或地区这一诱惑。正如高级专员刚才告诉我们的那样，叙利亚是大多数难民尚未准备返回的一个例子。许多返回地区的条件不安全。我们对某些情况下非自愿返回的报告感到关切，并呼吁各国按照国际法规定的义务行事，尊重不驱回原则。我们鼓励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及其伙伴加倍努力，监测返回原籍地区的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状况。在这方面，我请高级专员对鲁克班难民营居民目前的选择提出非政治化的看法，并说明他认为他们可以在何种程度上安全、自愿和体面地返回。

我们鼓励各国避免可能加剧流离失所的行动。如果法律权利、获得土地、住房、社会服务和经济包容等基本保障到位，难民的回返就更有可能是可持续的。这些措施降低难民需要再次跨越国际边界寻求安全的可能性。我们完全支持高级专员关于在流离失所危机一开始就寻找解决办法、解决流离失所的根源和驱动因素以及有效管理多种因素或混合移民潮造成的流动的讨论。正如蓬佩奥国务卿所说，最好的帮助方式是首先努力结束导致流离失所的冲突。寻求解决此类冲突是安理会的核心责任，也是我们必须充分承担的责任。

一年多来，我们一直试图通过本机构解决委内瑞拉人道主义危机的根源，但没有成功。委内瑞拉的邻国共收容了300多万难民，向这些国家暗示，局势没有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这样说在现在和危机开始以来一样，都是错误的。我们将继续——包括在明天的讨论中——就委内瑞拉人民悲惨的人道主义状况发出警报。

主席先生，我再次感谢你召开今天的会议，讨论世界各地数百万流离失所者的状况，他们对未来有着与我们所有人一样的希望和梦想：我们的儿童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享有民主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责任，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安全并有保障。美国将继续领导作出努力，支持这一未来。

贝克斯廷·德布伊茨沃夫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感谢你倡议召开今天的会议，感谢格兰迪先生富有启发性的发言。

大家知道，全世界流离失所者人数从未如此之高：6850万人，包括2500多万难民。因此，鉴于冲突与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流动之间的联系，今天的通报在安全理事会议程上有其应有的位置。在这方面，流离失所者人数的急剧增加不能成为我们预防、控制和解决冲突能力下降的标志。在许多情况下，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潮流的出现是一个警告信号。因此，它们应被视为预警信号，并应被纳入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的分析和报告，以提高我们的应对和预防能力。我想请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介绍他对该问题的看法。我们如何就预警的这一方面开展工作？

第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将保护工作置于其任务的核心。比利时通过与难民署建立强有力的伙伴关系，支持将保护工作置于核心地位。这种保护必须继续是支持流离失所者的所有人道主义行动的核心，因为这些人面临许多额外风险，包括歧视和严重侵犯其权利等风险。鉴于妇女和儿童更容易遭受侵犯，包括性暴力，我们呼吁联合国和其他人道主义伙伴特别关注她们的具体需求，并为性暴力受害者提供专门的医疗和心理社会服务。

关于保护，我们回顾指出，流离失所者视情况通过国际人道主义法和难民法受到人权保护。我们呼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尊重不驱回原则。

高级专员提到了回返问题。我们认为，回返和重返社会必须是和平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冲突各方必须提供必要的保障，确保难民能够以安全、自愿、有尊严、知情和可持续的方式返回。配套措施必须到位，以实现持久和解与过渡期正义。此外，难民本身以及旅居国外者可以为和平与和解努力作出宝贵贡献；必须支持他们在这些进程中作为行为者发挥作用。

第三，包括难民在内的被迫流离失所人数令人震惊，促使我们重申在难民问题上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比利时支持难民署制定的《难民问题全球契约》，并希望该契约的通过将有助于为该领域的国际合作注入新动力。鉴于近60%的难民仅由10个国家收容，85%的难民在发展中国家，《契约》非常正确地将支持收容国、分担责任和负担以及寻求持久解决办法列为优先事项。这种方法可以防止因为缺乏保健、教育和心理支持而失去几代人，特别是在长期危机局势中。

最后，我要赞扬高级专员及其团队所做的出色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以德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将从贝克斯廷•德布伊茨沃夫先生结束的地方开始。格兰迪先生，感谢你所做的工作。你的工作帮助了处境非常糟糕的人。我们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同事举了世界各地的例子。当我们谈论7000万难民时，我们谈论的是7000万个人——儿童、妇女和男子——的命运。因此，我们鼓励他继续工作。他总是洋溢着希望和乐观。我认为这是战胜挑战的唯一方法。但是，我们需要这样。我请求他继续努力。德国将永远支持他。我们努力成为一个可靠的伙伴。我相信，2018年，我们是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第二大捐助方。正如其他人要求的那样，我请他向其所有工作人员转达我们对他们所做一切的钦佩和支持。

正如我们的法国、比利时和美国同事所说，《难民问题全球契约》是一个真正的里程碑，显示了多边体系解决高度复杂问题的能力。正如高级专员所说，关键是团结一致，也正如这里其他人所说，公平分担负担和责任。布丁是否可口在于品尝。我们必须谈谈实施工作。

关于收容国，同我前面的其他发言者一样，我要强调，我们非常重视叙利亚邻国——约旦、黎巴嫩、土耳其、埃及——的行动。我们还重视孟加拉国和委内瑞拉邻国——从哥伦比亚到秘鲁到厄瓜多尔——的行动。这种行动极其重要。给予难民一个机会也非常重要，因为这使他们能够返回家园。当他们在第三国时，不太可能回到自己的家园。我们同意格兰迪先生和其他人关于回返的说法。回返必须自愿、安全、有尊严并充分知情。我们还讨论了鲁克班的情况。俄罗斯和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必须密切合作，保证回返的进行如前所述，回返者不会面临逮捕或强征入伍，其家园也不会被没收。

关于利比亚的可怕局势，我鼓励高级专员继续介入并留在那里。我想强调利比亚的一种现象。这事关妇女、儿童和难民的命运。在利比亚他们肯定是最脆弱群体，在其他地方也是。我们支持高级专员正在做的工作，并要求他特别重视这些难民的命运。

最后，我要谈及缅甸。高级专员可否再谈谈那34个项目？这些项目取得了什么成果？我们能否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

关于孟加拉国，我谨赞扬这个并不富有的国家所做的努力。那里的难民处境如何？我还听说他们可能被安置在一个岛上。孟加拉国境内的难民又会面临何种危险？若要帮助他们，我们能够或必须做些什么？

我现在恢复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我谨再次感谢大家遵守发言时限。在俄罗斯同事提出水平放置沙漏计时器后，海地外长采用了这种办法（见S/PV.8502），但我认为，如果不水平放

置沙漏计时器，我们也能很好地管理我们的时间。我还感谢大家提出各种问题。问题很多。

虽然我不知道高级专员是否与我一样乐见各位提出诸多问题，但我现在要请他对这些问题作出回应。

格兰迪先生（*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大家今天上午说了很多表示赞赏和支持的话。安全理事会是负责和平与安全的最高机构，也是与我们的工作密切相关的机构。这个机构以及许多——事实上是所有——安理会成员国代表均对我们表示支持，令人鼓舞。

为了简洁起见，我将尽量把我听到的诸多问题和看法归类，也许首先要谈及许多人提到的回返问题。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在开场白中提到了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必须再次明确指出，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认为，难民返回家园必须是安全、有尊严和有保障的。这是回返的三大支柱。如果我们要确保难民在得到国际保护的情况下回返，这些支柱必不可少。同样千真万确的是，如果回返是安全、有尊严和自愿的，且得到很好的支持，那么此种回返就有可能更加可持续。如果在不太理想的条件下回返，此种回返通常会导致新的流离失所现象。我们已在许多地方目睹此种情况。若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向这些民众提供帮助就会变得更加困难，由此造成的局势可能引发更多冲突。因此，这也是一个我请安理会成员从稳定/安全角度加以审视的问题。

但是，当然，如果难民选择回返——有时他们确实选择在困难的情况下回返，我们看到一些难民返回了叙利亚，我们还看到一些难民返回了其它困难的局势——那么，这些民众就需要人道主义支持。我们都知道，叙利亚境内的援助和重建工作是一个充斥着诸多政治因素和考量的问题。我促请并鼓励安理会成员不再将政治与民众的人道主义需求挂钩。在一场如此漫长的战争过后，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不可避免，但民众的人道主义需求必须得到满足。

同样非常重要的是——我在开场白中说过，但安理会给了我再次提出这个问题的机会——在叙利亚这样的局势中，难民回返地区应有我所领导的这个组织的人员。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缅甸及未来难民可能回返的其它局势。这也是我们保护职责的一部分，特别是如果我们要向难民传递一个信任信息，即，有一个中立、公正的机构在观察他们的回返，这种存在可能会令他们感到鼓舞。有时很难做到这一点。

在叙利亚，我们与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我们现在建立了一个机制。如果我们了解到回返者可能会遇到某些情况，我们就会向叙利亚政府报告。但是，只有我们在实地保持存在，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否则，我们就不能把这些报告交给当局。几周前，我在叙利亚时，与叙利亚政府就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们正在这方面取得一些进展。然而，我们需要得到更多的鼓励，取得更多进展，这也适用于鲁克班。我这是在回答美国代表提出的问题。

在鲁克班，那里的难民身份复杂，已有很长时间未得到人道主义援助。在其它联合国机构的帮助下，我们最近一次于3月份从叙利亚一侧派车队进入了鲁克班，也就是说，我们已不再派车队从约旦一侧进入该营地。但是，我们认为，这项工作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迫切需要一个解决办法。我们对鲁克班营地中难民的意图进行了调查。一旦安全保障措施到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想返回家园。很多难民的情况与他们的极为相似，我不仅向大马士革当局，而且也向霍姆斯省当局提出了这一问题，鲁克班营地中的大多数难民都来自霍姆斯省。当时，我表示，如果这些民众回返——我希望他们能够回返——我们可以在该省派驻人员，以确保那里的气氛能够让回返者保持信心。我知道，在鲁克班，各种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局势非常复杂，但我要鼓励那些有影响力、有办法的安理会成员促成

这一解决方案，并为我们的存在作宣传，使之成为一种额外的保障，即，如果难民回返——他们确实希望这样做，他们的回返将是安全的。

印度尼西亚代表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他提到的是一种经常出现的情况。我想说的是，当我说如果人们认为条件不适合回返，他们也有权不回返时，确实存在接下来怎么办这个问题。我不仅想到最近的一些危机，而且还想到了，比如，已流亡几十年——到今年已流亡40年——的阿富汗人，以及在非洲之角生活了25至30年的索马里人。不幸的是，这个名单很长。冲突往往旷日持久。那么，我们应该为收容这些难民——实际上是数代难民——的国家做些什么呢？我认为，这是印度尼西亚代表所提问题的实质，十分重要。

我认为，这是《契约》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制定《契约》不仅是为了应对新的紧急情况，而且旨在应对长期存在的紧急情况。《契约》旨在调集各种资源——不只调集人道主义资源，而且还调集发展资源，动员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发挥作用等。这确实是一个新的范例。有人提出了另类筹资模式问题，我认为《契约》已在促进此类筹资。我们已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约15个国家实施该契约。我们看到，在帮助收容国承担其长期以来所承担的责任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寻找解决办法，特别是解决回返问题的办法。我们还必须继续指出，被许多安理会成员称为重要解决办法的重新安置依然很重要。我确实感到关切的是，在过去几年里，全球获重新安置的难民人数大幅下降。重新安置绝不是一个适用于许多人的大规模解决办法，但对那些极易陷入逆境的弱势者来说，这是一个可以选择的解决办法。因此，我鼓励安理会继续审视这一方面。

我要再次谈谈《契约》、其意义以及我们想要调集的新资源，我非常愿意赞同美国代表——美国是迄今为止难民署最大的财政资助方——发出的呼吁，即，有必要扩大“捐助方”的范围，而且不应只通过难民署提供捐助。《契约》鼓励大力支持难民收容国。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确实已经展示了具体的做法，私营部门也兴趣浓厚。几天前我出席中国博鳌亚洲论坛，对中国私营部门支持全球人道主义行动的兴趣之大感到惊讶。我认为，我们可以而且正在探索各种非常重要的新途径。

波兰代表发言谈到贩运问题，这是我们都想要打击的祸害。安理会也一直在处理此事，重点大都放在控制和安全方面，这无可厚非。贩运人口是一种犯罪活动，需要应对。我认为，还需要更全面地看待该问题。方法之一是建立合法途径。在移民领域，建立合法的移民渠道，是打击贩运活动的最佳办法，最终可切实遏制贩运活动。但移民不是我的专长领域。

也有人谈到具体局势，如联合王国代表谈到利比亚问题。我认为，安理会清楚，在此问题上，当务之急是制止目前的敌对行动升级。我和秘书长一样，呼吁所有成员以团结、有力的方式促成这项工作。安全理事会必须表明立场，因为利比亚现在发生的情况非常危险。如果确实发生，我认为需要重新调整法国代表提出的有关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等机构与该国当局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不能继续在持续不断的压力、威胁和恐吓及承诺朝令夕改的情况下作业。若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另一种合作模式。我们希望安理会帮助我们找到这一合作模式，但首先需要停止敌对行动。

不幸的是，必须指出，鉴于缓解目前敌对行动激增状况的前景不得而知，我认为，我们也必须准备可能出现进一步的流离失所局面，包括在一些邻国，我们目前正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关于缅甸，最近批准的34个项目，是难民署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根据谅解备忘录得以进行的三轮评估其中两轮的结果。根据评估，需要执行10倍以上的项目，但这是我们过去几个月在若开民族军攻势开始之前的狭窄时间段内所能做的。这确实是一个挫折。但政府确定和批准的一些

项目现已获准实施，这是一个好迹象。我们需要再接再厉。

但让我再次指出，需要审视其他方面。我们需要审视罗兴亚人行动自由的问题。缅甸境内现在还有许多罗兴亚人。如果不采取措施减轻歧视，防止边缘化，将无法鼓励在孟加拉国的罗兴亚人回归。这是关键问题。不是简单地决定这些人应该返回，需要创造条件。有人说我乐观洋溢，对此我感到鼓舞。若要在如此艰难的局势下开展工作，需要一点乐观。我对此认可感到鼓舞。如前所述，我希望尽快到访。如果能去若开邦北部，我定会出访。我认为，对我来说，就地观察当地局势非常重要。我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开发计划署和难民署已向缅甸政府表示，他们已准备延长谅解备忘录，但希望如果延长，能够带来一些实际结果。我们尚不知能否延长。

科威特代表提出了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让我再次指出，准入是这里可能涉及的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在缅甸，准入和在场也很重要。我重申，允许人道主义组织进入民众处境脆弱的地区继续是关键所在。

最后。我感谢赤道几内亚代表在其第一次发言中提醒我们。因为开始只给我15分钟时间，我未能提及今年是“难民、回返者和境内流离失所者：争取持久解决非洲境内被迫流离失所问题”年和1969年《关于非洲难民问题某些特定方面的公约》五十周年。该《公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文书，赤道几内亚承担开展一系列活动纪念这种声援的任务，这种声援在非洲非常强劲和普遍。应当记住，我说的不仅是国家，而且包括我曾经旅行到访过的无数非洲村庄中难民得到的声援，这通常意味着在没有任何其他资源的情况下分享极少的可用资源。

我认为，各方协同努力极为重要。与非洲联盟的伙伴关系非常强有力，而且我认为可以进一步发展。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解决难民危机，找到解决方案的正确方法是以区域为基础。在索马里难民问题上，通过与政府间发展组织和非洲联盟合作，加强收容国国内的保护工作，并寻求索马里境内解决办法，我们学到了不少经验教训。下一个机会将是，如果南苏丹和平进程取得进展（我们正在密切关注这一进程），也将提供机会合作，解决大规模流离失所的问题。南苏丹人口三分之一流亡他国。我们一直在与各方、政府间发展组织和非洲联盟讨论，重要的是让流亡他国的南苏丹人了解和平进程的进展情况并发表意见。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必须记住，这些民众过去至少已经三次离开该国，他们对和平的信任非常脆弱。若要取得他们的信任，必须以正确的方式加以培养。这是我们需要培植的与非洲联盟合作的一个实例。

我还要指出，今年是我的前任、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发起的难民署另一项关于减少和消除无国籍状态重要行动的中点。这也是美国代表提到的我们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将在10月执行委员会会议前后举办一次有关无国籍状态问题的特别活动。12月将举行全球难民论坛，纪念《契约》一周年。我们希望会员国派部长参加会议，展示自《纽约宣言》以来取得的进展，并承诺今后作出努力并参与。

最后两点。我感谢法国代表提及支持难民署姐妹机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必要性，此事至关重要。该区域的稳定也有赖于难民人口能在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协助下继续就学，获得就业和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前任总干事，我不仅为此向他表示感谢，而且因为受此未解决问题影响的各国也是叙利亚难民的收容国。在向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支助时，需要同时牢记这两大因素。

最后一点是，我赞赏许多发言者强调把人道主义援助、人权、发展与和平与安全工作联系起来的重要性。我认为，这是秘书长鼓励所有联合国机构和会员国参加的改革的核心。我认为，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他真有雄心将这些有时相互紧张对立的

不同观点汇集在一起，并力图勾勒出一条联合国可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前进道路。

当秘书长就各种问题主持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时，我们经常被邀请参加，尽管我们不是常任成员。这实际上是分析这一危机所有层面并确定联合国立场的地方。我认为，此事在联合国这一届管理层的优先事项清单上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

在谈论和平与安全时，重要的是，不应忘记那些遭边缘化和排斥最严重的人，决不可让这些人掉队。难民就是这样的人。在讨论解决办法时，必须记住也要让他们参与。

在座有些人非常客气地说，我们应更频繁地进行交流。我只想说，这要由安理会来定。正如安理会所了解的那样，我总是随叫随到。我来这里也为谈论具体局势。我认为，科威特大使如此清楚描述的难民问题与安理会处理的和平与安全有关问题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今天上午的辩论会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我再次感谢安理会成员耐心倾听我们的看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格兰迪先生的这一发言以及他最初的发言，也感谢他对提出的所有问题和发表的所有意见作出回应。我想我是代表大家表示这一谢意的。

中午12时散会。